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

金融科技赋能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本报记者 焦源源

数字化转型提速

中国证券报：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影响下，当前金融科技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杨涛：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较大冲击，也对金融科技运行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具体看，一是在疫情之下，我国从经济、社会、金融层面，更加重视数据信息的优化、标准化，运用大数据方法以解决信息不对称，为数字化时代奠定重要的生产要素积累。二是疫情的冲击为客户端带来了新的冲击与影响，催生了一批积极拥抱数字经济的新客户，值得未来继续关注。三是金融机构更加重视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拥抱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产品与服务的线上化、移动化、智能化。四是科技助力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受疫情影响的实体经济，在特殊环境下经受了实战考验。五是从经济社会层面来说，新技术难以“单兵突进”，离不开制度规则、文化伦理等方面的合理、透明、规范。

就金融业的变化看，一是“抗疫”促使非接触、零接触金融服务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尤其从金融机构供给和客户需求两端带来深远影响。原有对线上服务偏好较低的客户，如个人客户中的中老年、部分高净值人群，以及众多企业客户，都对数字化、非接触金融服务变得更加适应。

二是针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有所提升。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数字信贷发展水平每增长1%，疫情对经营的冲击减少2.57%。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突破技术瓶颈，发展数字信贷，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力有望降低。需要注意的是，中小微企业面临困境并非仅靠融资能够解决，金融科技在其中也“独木难支”，更需多方合力解决。

三是加强了金融服务供给的多渠道、多视角协同。过去金融机构不同部门、渠道缺乏协同。而在疫情的压力下，面向客户的多元服务协同能力也遭受了考验，促使金融机构真正实现转变。

四是更重视B端的金融业务，尤其是基于供应链、贸易链、产业链的产融结合式创新；多数金融机构都努力运用大数据和新技术来缓解原有“短板”，并且积极进行平台模式合作，寻找B端最佳场景。当然，也有一些“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以供应链金融为例，有许多难点并非仅靠数字化、线上化就能解决。

五是出现全新的风控压力。对许多线上业务与金融科技积累较少的银行来说，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而当金融机构试图服务那些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传统行业时，金融科技也变得“束手束脚”。

六是金融机构自身的“数字化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地开发线上产品，而是对金融机构战略管理、经营文化的全面革新，以及对内部治理、组织架构、人才能力的再造。

七是非融资性服务加快拥抱新技术，包括B端支付服务、风险管理、投资与财富管理。

支持小微练好内功是根本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当前的小微企业融资难痛点？

杨涛：根据上半年央行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过比较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小微企业融资2020》的调查数据，发现我国小微金融的某些特点。如：我国中小企业贷款占比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不良率相对处于低位；贷款利率与美国接近，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低得多。这些研究结论，实际上可以引起诸多反思。一方面，目前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另一方面，要考虑的是随着中小微企业信贷规模迅速上升，究竟如何认识和把握“融资难”？

我们可以做几个判断：一是需进一步明确小微金融发展的目标次序。给小微企业贷款支持不是最终目的，归根结底的政策目标，是希望小微企业活下来还是生存得更好？是重点解决就业、服务技术进步还是产业链重建？不同优先目标会导致差异化的政策重点与发展路径。二是当前小微金融发展中的矛盾，或许已经逐渐从供给方向向了需求方。三是支持小微企业真正练好发展“内功”，才是政策着力的根本。否则即便让中小微企业加更多杠杆，可能也无法解决其持续发展的难题。四是需要不断培育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土壤与环境。五是需关注金融之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产业金融研究基地主任、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之下，我国从经济、社会、金融层面，更加重视数据信息的优化、标准化，为数字化时代奠定重要的生产要素积累。疫情催生了一批积极拥抱数字经济的新客户，值得未来继续关注。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痛点，金融科技在供给层面可做更多优化，推动机构数字化与产品线上化，降低成本并提高效率，使传统金融机构把中小微金融服务领域作为新的蓝海。同时，应充分利用新技术给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赋能。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协助小微企业提升管理能力、人才能力等。监管部门应在政策性金融手段中直接鼓励新技术应用，促使市场化金融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场景合作落地。

匹配相应制度来加以缓解。一是借鉴如美国经验，制定《准时付款法》来约束应收账款拖欠；二是运用前沿技术模式进行信息登记和技术规则约束。同时，运用科技手段也能使小微企业更有效地进行财务管理和现金流管理。

中国证券报：政府政策如何更有效地应对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并且促进金融科技的充分应用？

杨涛：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小企业支持政策的目标。小微企业支持政策，究竟应优先考虑充分就业、持续经济增长、创新发展，还是稳定物价等目标？这是讨论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

其次，需要深入探讨小微企业的真正政策需求。一方面，要明确金融在解决中小企业发展痛点中，究竟占多大分量？因为小微企业面临的难题，可能来源于财税费、运营成本、内部管理、产业链、市场交易环境、环保卫生人力等政策、营商环境等。另一方面，其金融需求也需要进一步解析。如包括资金需求（长期还是短期）、产融支持类需求（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综合风险管理需求（保险、担保等）、信用支持需求、支付结算类需求、财务管理类需求、专业信息类需求等。

然后应考虑如何改善小微金融的供给，以及如何更好地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一是政策性金融，二是商业性金融，三是合作性金融。在这些活动中，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引入金融科技手段，解决“成本高、效率低”的核心难题。

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在政策性金融手段中直接鼓励新技术应用。同时，创造生态与条件，促使市场化的金融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场景合作落地。

还需注意的是，对优质中小企业“抓重点”，需增加长期资金供给来源。因为，我国主要的资金都在银行部门，优质中小企业最缺的是长期股权投资。由此需要在现有银行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基础上，能否进行更多政策突破？（如风险权重与资本占用）如何促进股权资本的长期化？对此，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同样可以促使长期资本更好地与优质小企业对接。

重视七方面监管

中国证券报：在推动金融科技服务小微



新华社图片

紧盯会计报表 打击恶意规避退市行为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郑忠良

近日，*ST富控对其2019年报进行了更正。经纠正相关会计处理事项后，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3.09亿元。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因最近两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ST富控触及暂停上市情形。

随着注册制的持续推行和新证券法的颁布，证监会将完善退市制度特别是强制退市作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内容，取得了显著成效。强制退市主要包括重大违法退市、面值退市和财务问题退市。重大违法退市由于有确凿重大违法行为，面值退市是基于市场投资者选择的结果，这二者相对容易界定，财务问题退市由于涉及复杂的会计准则和专业的会计判断，在实践中较难认定，给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也给了上市公司很大的操作空间。一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手段恶意规避退市，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必须加以严厉打击。

防止“公允价值”被滥用

加入WTO以来，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不断接轨，国际上通行的“公允价值”概念在我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不可否认，公允价值有其理论上的优越性，但由于其应用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条件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这就给上市公司留下了操纵的空间。在会计实践中，公允价值经常遭到滥用，特别是在各种减值中大行其道，最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商誉减值。商誉本是在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成本大于合并方取得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其存在无法与企业自身分离，不具有可辨认性。相关准则规定，商誉确认后，后续期间不再摊销，而是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确认商誉减值，因为这会减少资产、降低利润。在确认商誉减值时，往往把减值作为利润调节的手段，有的甚至采取“让我一次亏个够让我一次亏个够”的策略，为以后的利润增长预留空间。上市公司2018年年报显示，共有87家公司计提了1658亿元的商誉减值损失，与2017年的3671亿元相比，同比增长高达351%。有些公司的商誉减值甚至超过其市值。究其原因在于2019年初，财政部针对“商誉及其减值”的议题征求了相关意见，大部分委员建议将外购商誉的账面价值逐渐减记至零。外界对此解读为现有的“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将改为“摊销”，这一做法无疑将减少上市公司的利润。上市公司未雨绸缪，纷纷计提大额商誉减值。2019年11月证监会发布《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明确合并形成商誉每年必须减值测试，不得以并购方业绩承诺期间为由不进行测试。受此消息影响，2019年度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声应回落至1000亿元左右，下降幅度高达30%。

鉴于公允价值在实践中常常遭到滥用，建议修改和完善相关会计准则，比如规定商誉和无形资产等必须在规定期限内摊销，从而遏制利用公允价值调节利润和净资产等财务指标以恶意规避退市的行为。

警惕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经营，从理论上而言，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有其合理成分，但在实践中却成了上市公司调节利润和净资产的手段。比如甲公司2019年3月发布公告，通过改变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预计残值率及船舶坞坞维修分摊期限等，预计将增加公司2019年利润总额约10600万元。乙公司在2015年和2016年均巨亏的情况下，于2017年变更了固定资产折旧等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后将其净利润和净资产。丙公司2015年亏损，2016年通过会计估计变更少计提6.45亿元折旧，从而避免了连续两年亏损。

这些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只是一种“数字游戏”，并不会提升企业经营能力，不会带来企业收入的增加，也没有产生经营性现金流量，不会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有鉴于此，建议对于因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等带来的净利润和净资产的变化，以变更前后期孰低者为准。此举将有效遏制上市公司企图通过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等增加利润和净资产以恶意规避退市行为。

重点关注偶发性业务影响

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开展要求履行相应的业务流程，执行必要的内部控制程序，取得适当的单据和凭证。上市公司利用日常经营活动恶意规避退市难度可想而知。但如果通过一些偶发性业务，比如取得政府补助、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等方式来调节净利润和净资产则相对容易很多。如果乳业上市公司2013年亏损，2014年加上各类政府补助5673万元后，当年净利润为4137万元。如果没有这些政府补助，公司2014年将连续亏损，难逃被ST（特别处理）的命运。某上市公司2017年和2018年连续2年分别亏损1.3亿元、27.7亿元，存在退市风险。2019年度公司通过债务重组豁免债务金额6.87亿元，通过关联方提供捐赠现金3000万元等多种方式，最终实现年度净利润和净资产双转正，避免了退市的结局。

目前的股票风险警示、暂停上市仍以单一连续亏损为标准，亏损标准为净利润并非扣非后净利润，这给了上市公司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利用各种偶发性业务活动操纵利润从而避免退市。建议交易所重点关注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风险警示、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标准调整为扣非后净利润，从而遏制上市公司利用偶发性业务调节净资产和净利润以恶意规避退市的行为。